

《毛澤東語錄》的民間日語翻譯及其意識形態

曹嗣衡

二十世紀 60 年代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後，積極對外宣揚毛澤東思想，輸出革命，其中一個手段是翻譯《毛澤東語錄》（《毛語錄》）傳播到全世界。日譯版是《毛語錄》最多的外語版本，大多為民間翻譯。不論是歷史學、翻譯學，至今對《毛語錄》的研究相當匱乏，而學界過往對翻譯與意識形態的研究集中在文學與宗教文本，對政治文本及其日語翻譯涉獵較少。對此，本文透過比較《毛語錄》民間日語譯版的譯文、註釋，考察政治文本的翻譯與譯者意識形態的關係，探索不同的意識形態有無或如何介入翻譯之中。

關鍵詞：《毛澤東語錄》、意識形態、毛澤東、竹內實、中嶋嶺雄

收件：2023 年 7 月 5 日

修改：2023 年 9 月 22 日

接受：2023 年 11 月 30 日

The Non-Official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Zedong* and Their Ideologies

Chi-Hang Cho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in the 1960s, China had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Mao Zedong's thought abroad and exporting the revolution, and one of the means of doing so had been to translate the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Zedong* (or *Mao's Quotation*) and disseminate them to the world. Japanese language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foreign language version of *Mao's Quotation*, and most of them have been translated by non-official Japanese. There is a dearth of research on the *Mao's Quotation* in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on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have focused on literary and religious texts, but not on political texts and their Japanese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s of political texts and the ideologies of the translators by comparing the translations and notes of the non-official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Mao's Quotation*, and exploring whether or how different ideologies intervene in the translations.

Keywords: *Mao's Quotation*, ideology, Mao Zedong, Takeuchi Minoru, Nakajima Mineo

Received: July 5, 2023

Revised: September 22, 2023

Accepted: November 30, 2023

壹、前言

二十世紀 60 年代後半，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全球左翼運動風氣處於高潮，毛澤東思想猛烈輸出海外，其中一種實體輸出毛澤東思想與革命的方式，就是傳播《毛澤東語錄》（下稱《毛語錄》），日本是其中一個目標地點。據統計，日譯版《毛語錄》是最多的外語版本（唐炎明、唐亞明，2019，頁 45—51）。部分譯本的出版資料如表 1：

表 1

日譯版《毛語錄》資料

譯本代號	譯者	原書名	出版單位及年份
A	外文出版社	《毛主席語錄》	外文出版社，1966 年
B	毛澤東語錄研究会	《毛澤東語錄》	宮川書房，1966 年
C	中島嶺雄監修，市村水城譯	《全訳毛澤東語錄》	いずみ書房，1966 年
D	和田武司、市川宏	《毛澤東語錄》	河出書房新社，1966 年
E	竹內實	《毛澤東語錄》	角川書店，1971 年
F	中嶋嶺雄	《毛澤東語錄》	講談社，1973 年
G	竹內實	《毛澤東語錄》	平凡社，1995 年

由於《毛語錄》日譯版之多，如果要為譯者的性質作分類，可有幾種取向。第一，官方與民間：只有譯本 A 屬於官方翻譯，B 至 G 都是日本民間翻譯；第二，團體與個人：譯本 A、B 屬於團體翻譯，亦即真正是誰翻譯不得而知，C 至 G 都是具姓名的譯本，中嶋嶺雄、¹ 竹內實各與兩種譯本相關；第三，政治取向：這取向的分類較複雜，假如折衷地分為左派與右派，則 A、B、

¹ 中嶋嶺雄的名字唯 1966 年的譯本採用「中島嶺雄」。本文行文將用「嶋」，惟在引用該年譯本時才用「島」。

E、G 屬左派，F 屬右派，C 與 D 難以判斷。² 然而這分類並不圓滿，若只考慮民間譯者，有中嶋嶺雄這樣立場鮮明地否定毛澤東的右翼學者；有隸屬社會主義研究所的毛澤東語錄研究會，其委員多是高調支持毛澤東和文革的社會黨成員；竹內實雖然對毛澤東評價相當高，但他否定文革。民間日譯《毛語錄》版本眾多，完全不能簡化為配合中國對外輸出毛澤東思想的目的，尤其眾譯者的政治取向差異頗大，可以預期眾譯本或多或少會反映不同的意識形態。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不僅是學術界，翻譯者本身也逐漸注意到意識形態在語言與翻譯中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兩者的關係及相關課題開始被討論（Gilbert, 2018, pp. 229-230）。Hatim 與 Mason（1997）是探討意識形態介入翻譯的先驅，指出「翻譯者在社會語境中活動，且是該語境的一部分。正是在這意義上，翻譯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活動」（p. 121），翻譯者的意識形態在翻譯過程中有不同程度的介入。介入翻譯活動的意識形態，有可能是來自翻譯者有意識的「意識形態」，也可能是來自翻譯環境（Munday et al., 2022, p. 181），亦即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有主動或被動兩面向。正如 Tymoczko（2014）所言，翻譯的意識形態不僅在文本本身，也存在於譯者的立場、接受翻譯者之中，即使翻譯同樣的文本，意識形態的影響程度也不同（p. 183）。本文討論的日譯版《毛語錄》，正是相同文本、不同譯者的意識形態與翻譯關係個案探討。

歷來對翻譯與意識形態的研究集中在文學與宗教文本，因此 Cunico 與 Munday（2007）特別以「翻譯與意識形態」為題，於翻譯研究期刊 *The Translator* 展示了翻譯在不同語言、語境及文本下，翻譯者如何處理社會與語言權力之間的角力（pp. 141-149）。本文主要關心的是相較於文學、宗教文

² 關於 C 的譯者市村水城的資料相當少，只知他與中嶋同是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科同學，往後成為記者。中嶋在何等程度干涉翻譯，並不清楚。中嶋嶺雄（1973b）言譯本 C 與自己「有關」（頁 4），沒有說參與翻譯，因此姑且視此譯本為市村水城獨立翻譯。譯本 D 的譯者和田武司、市川宏同為中國研究學者，以研究古典文學為主，前者曾在日語雜誌《人民中國》工作並任教於拓殖大學，後者任教於法政大學。兩人不活躍於論壇或政壇，其譯本中無表達肯定或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文字，因此無法以政治取向為此譯本分類。

本，那些本來就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政治文本，如何被意識形態再製造？Munday (2007) 研究拉丁美洲革命領袖、前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卡斯楚·魯斯 (Castro Ruz) 及前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維茲 (Hugo Chávez) 等人的演說、小冊子、訪問等政治文本的英譯版，有趣地指出一些文本即使被「潛在的敵對媒體」翻譯，「實際上或許更忠於那些源文本結構和信息，因此不可能根據目標文本的發布渠道來預測翻譯策略」(pp. 213-214)。這表示縱然翻譯者與文本內容或文本作者持對立的意識形態，亦不代表翻譯者會有意無意地改變文本意思，以遷就或迎合自己的意識形態。反過來說，翻譯者即使完全擁護文本內容、支持作者，分享相似意識形態，亦不代表其翻譯特別準確。因此這樣草率的結論顯然不被認同，即：因為翻譯者無可避免地持有其意識形態，所以譯文總是反映翻譯者的意識形態。

歷來關於毛澤東思想海外傳播的研究豐碩，但《毛語錄》的研究卻寥寥可數。Cook (2014) 所編的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是其一，論文集以《毛語錄》為線索，探討了《毛語錄》如何做為毛澤東思想的象徵物，在世界各國產生影響力；程映虹 (2008) 《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以一章簡略地提及《毛語錄》的世界傳播，但只是對前書的概括，沒有新猷。兩者以歷史角度考察《毛語錄》在世界各地的影響、接受情況，並未走進書的內容進行研究。唐炎明與唐亞明 (2019) 考察了《毛語錄》的成書背景與經過，並詳細地羅列了不同語言版本的《毛語錄》資料，但仍屬歷史論述。以歷史視角研究《毛語錄》的著述已不多，遑論翻譯研究。

就筆者所見，既是先驅亦是唯一一篇比較《毛語錄》日譯版的文章，是山中竜視 (1967) 〈『毛主席語錄』の各訳本について〉。該短文以文法、詞彙為切入點，簡略考察了 1966 年出版的四種《毛語錄》日譯版 (即表 1 譯本 A 至 D) 的翻譯問題，批評了四種翻譯皆有不足，歸因於譯者翻譯技巧不足、缺乏中國知識、不了解中國語結構等。該文提到各譯本在文法與詞句等語文問題，但發表於「書評」欄目，篇幅短，並非以翻譯研究角度撰寫學術論文，未有觸及各譯本的意識形態問題。該文見證了《毛語錄》日譯版出版

初期的盛況，礙於其出版時間，使之未有機會觸及往後出版的譯本。本文當然亦無法同時觸及所有譯本，但比起集中研究同一年出版的譯本，本文研究的版本遍及 20 世紀 60、70、90 年代，希望擴闊《毛語錄》日譯版在時間軸上更高細膩度的研究。

在以上的研究基礎，本文將透過同樣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毛語錄》日譯版，探究兩個問題：第一，持不同意識形態的譯者，對同一政治文本的翻譯有何不同？第二，如果這些譯者或團體對文本與作者具有強烈情感，不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會否或如何在翻譯文本中或明示或暗示地表達和透露？譯者與文本作者的意識形態是否相似，未必與譯文的準確度掛勾。同樣地，本文亦極力避免另一個思想陷阱，即：當持認同或反對文本作者立場的譯文出現與原文不符的地方，或出現與其他譯本明顯不同的譯文時，便簡單地歸結之為譯者有意無意地美化或醜化、擁護或批判文本及作者。固然，利用同一文本並比較各種翻譯異同的好處是，如果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說該譯本的「意圖」或「嫌疑」更大。另外，不僅是譯文本身，註釋、解說文章等都在此處所指「文本」的範圍之內。因為這些文字提供了解答上述提及第二個問題的啟示，翻譯者不一定在譯文內透露自己的意識形態，可以在「譯本」以內，「譯文」以外的地方透露。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文將從不同政治立場的譯者對同一文本《毛語錄》的不同翻譯，以及這些譯本的譯文、註釋、解說文章，探討譯者翻譯與意識形態問題。本文所分析的《毛語錄》是兼屬民間和政治取向清晰的譯本，即以譯本 B、E、F、G 為材料。譯本 C、D 的政治取向、意識形態並不突出，但由於同屬民間翻譯，在比較各譯本時亦會提及，以作對照。³ 為方便參照，以下再就本文反覆引用或提及的譯本依討論順序重新編次排序：

³ 這並不代表譯本 C、D 的譯文譯得準確。事實上，有具有明顯意識形態的譯本在某些地方譯得比這些譯本還要準確（詳見第肆節）。因此兩譯本於本文的意義在於當討論某譯本的翻譯時，在用於對比「其他譯本」時多添一個意識形態相對隱藏的例子作對照。另外，本文集中在研究日本的民間譯者與譯本之意識形態，故摒棄中國官方的譯本 A。

表 2

本文探討的日譯版《毛語錄》

譯本編號	譯者	出版年分
①	毛澤東語錄研究会	1966
②	竹內實	1971
③	竹內實	1995
④	中島嶺雄監修，市村水城譯	1966
⑤	中嶋嶺雄	1973
⑥	和田武司、市川宏	1966

所選譯本的譯者顧及了各種層面，以提高文章的完整性：第一，既有個人亦有團體譯者；第二，有貼近文革爆發時點、文革中期的、文革終結以後的譯本，以顯示不同社會氣氛對翻譯的影響；第三，有譯者左傾、左傾但反對文革，以及右傾的譯本，以探究持不同觀點的譯者對同一文本的處理；第四，同一譯者不同時期的版本，以反映個別譯者的意識轉變與翻譯的關係。本文試圖指出，不論有意或無意，有譯本的「譯文」本身確實有反映譯者意識形態的地方，或換句話說，是譯者有將其意識形態投入於譯文的「嫌疑」，但更多譯本的譯文則沒有。不過，本文還試圖指出，不在譯文中透露意識形態的譯者，將會另闢蹊徑，在註釋等其他地方顯示其意識形態。

貳、展示意識形態的嫌疑——毛澤東語錄研究會譯本

毛澤東語錄研究會隸屬於社會主義研究所，他的六名社會黨員兼眾議院或參議院議員楯兼次郎、楯崎彌之助、藤田高敏、大柴滋夫、野野山一三、鈴木力曾在文革初期到訪北京，正面評價了文革（〈文化大革命、高く評価する〉，1966，版2）。六人對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感到無比興奮，既支持毛澤東，亦為文革搖旗吶喊，對《毛語錄》此「紅寶書」也相當熱情，

所以當毛澤東語錄研究會翻譯並推出《毛語錄》譯本（下稱研究會譯本）時，六人在譯本的「發刊辭」表露了相當明顯的情緒：

毛澤東思想現在如同惑星般耀眼地照耀著全世界。究竟世界的人民，於越南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人民戰爭遊擊戰術戰勝美國資本主義的超近代兵器這一現實上，又或者在說著「雖然文化大革命是現今中國前所未有的一條道路，但畢竟全世界的人民都會踏上這條道路」的中國的自信上，應該學習甚麼？特別是作為鄰國的日本，中國的產業發展愈接近日本，其思想對國民也會帶來有形無形的影響吧。這或許比在百年基督教進入日本帶來的影響更大，〔我們〕不可以視毛澤東思想為無物。（毛澤東語錄研究会，1966，頁7）

他們認為將毛澤東思想比喻為「惑星」，在越戰中「戰勝美國」，預期全世界將踏入「文化大革命」，蛻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毛澤東思想為「鄰國的日本」帶來的影響，將會超越基督教。眾人又說，譯本「在北京得到來自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對普及毛澤東語錄全譯日語版的諒解」（毛澤東語錄研究会，1966，頁7-8），指的是在得到中國一方同意前，擅自翻譯並出版日譯《毛語錄》並得到「諒解」，可以斷言，研究會譯本本身就是主動與中國文革隔海呼應的產物。問題是這樣的熱情如何，或者更基本的是否反映在譯文上？為了回答這問題，此節將走入研究會譯本的譯文，就其翻譯方法，特別是詞語選擇、增譯（amplification）和誤譯（mistranslation），驗證其翻譯與意識形態。

首先是詞語選擇。在眾民間譯本中，研究會譯本選擇的詞語語氣最重，在一些簡單的詞語上，出現其他譯本譯文相同，唯獨研究會本不同的情況。《毛語錄》第二章「階級與階級鬥爭」第八項末句云：「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1995，頁9）。「推翻」一詞的翻譯，唯獨研究會譯本不同：⁴

⁴ 由於譯本②、③皆由竹內實翻譯，譯本④、⑤皆與中嶋嶺雄相關，因此比較時只取兩人時期較前的譯文為準，以配合同在文革熾熱的時代背景。

表 3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八項「推翻」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革命は暴動であり、一つの階級が他の階級をぶっ倒そうとする猛烈な暴動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a, 頁 27)	革命は暴動である。ひとつの階級がひとつの階級をくつがえす激烈な行動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71, 頁 30)	革命は、暴動であり、一つの階級が他の階級をくつがえす激烈な行動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c, 頁 14)	革命は暴動である。ひとつの階級が他の階級をくつがえす激烈な行動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b, 頁 17)

註：本文表 3 至表 19 文字之底線由筆者所加

其餘譯本皆用動詞「くつがえす」，研究會本則用「ぶっ倒す」。前者詞義近於「推翻」，「倒す」則近於「打倒」，「ぶっ」為加強動詞動作與作用的前綴，為動詞「倒す」增強氣勢，使之成為更接近口語的詞語。據筆者統計，《毛語錄》原文出現八次「推翻」，四個版本共運用了「くつがえす」、「ひっくりかえす」、「打倒する」、「倒す」和「ぶっ倒す」，唯獨研究會本使用了語氣最激烈、口語化的「ぶっ倒す」。同一段落，還應注意到原文指革命為「暴動」，是「暴烈的行動」。日語系統同樣使用漢字，只有研究會本將「行動」演繹為「暴動」，其餘譯本皆跟從原文，保留「行動」。然而，或許同段先有「暴動」一詞，使研究會本譯者產生手民之誤。這裡不無此可能性，這個誤譯的問題，本文將在之後詳細討論。無論如何，此譯文在眾多譯本中，毛澤東所指「革命」的暴烈程度，無疑以研究會本最為激烈。

其次，研究會本對虛詞的翻譯同樣別出心裁。《毛語錄》第一章「共產黨」第三項云：「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1995，頁 2）。在連詞「和」的譯法上，研究會本別樹一幟：

表 4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一章第三項「和」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中国共産党の努力がなく〔……〕中国の独立と解放は不可能であり、中国の工業化や農業の近代化も、また不可能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a, 頁 18)	中国共産党の努力がなければ〔……〕中国の独立と解放は不可能であり、中国の工業化と近代化も不可能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71, 頁 21)	中国共産党の努力がなければ〔……〕中国の独立と解放は不可能であり、中国の工業化と農業の近代化も不可能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c, 頁 9)	中国共産党の努力がなければ〔……〕中国の独立と解放はありえないし、中国の工業化と近代化もありえない。(毛沢東, 1966 / 1966b, 頁 10)

在第兩個「和」字，所有譯本都選用「と」，但同時只有研究會本在第二個「和」字選用「や」。在日語中，表示列舉的「と」與「や」有細微差異，「と」一般是全部列舉，「や」則是部分列舉。研究會譯本用「や」產生另一種語境，指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就沒有中國的工業化、農業的近代化，以及其他成果；其他用「と」的譯本，則指只是沒有中國工業化與農業近代化。固然，還不可不指出，譯本②、⑥將「農業近代化」的「農業」省略了，這無疑將中國共產黨的功勞提高了。但整體來說，研究會譯本不採用減譯，而傾向透過選詞、增譯，在語意異於其他譯本。而這種相異，往往傾向更加褒揚毛澤東思想。

將「推翻」譯為「ぶつ倒す」，「和」譯為「や」，可能是譯者判斷和推敲原文語境、語氣的結果，在客觀效果上加強了原文的意識形態，卻不能以此為唯一證據，判斷意識形態介入了翻譯。不過，除了詞語選擇，研究會譯本有增譯和誤譯《毛語錄》的情況，這有助更了解意識形態介入了此譯本翻譯的情況。

增譯是研究會譯本偶爾運用的翻譯方法，其增譯的效果往往突出了毛澤東思想的優秀。例如《毛語錄》第二章第六項：「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毛澤東，1995，頁 9）。研究會譯本在虛詞、動詞上增譯，亦只有此譯本有增譯：

表 5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六項「靠」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人民はわれわれによ つてのみ、組織され る。中国の反動分子 は、われわれによっ て組織された人民に よつてのみ、打ち倒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 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a, 頁 26)	人民を組織すること は、われわれにかか っている。中国の反 動分子は、われわれ が人民を組織してそ れを打倒することに かかっている。(毛 沢東, 1966 / 1971, 頁 29)	人民は、われわれに よつて組織されるの である。中国の反動 分子は、われわれが 人民を組織すること によつて打倒される の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c, 頁 13)	人民は、われわれ が組織するのだ し、中国の反動分 子は、われわれが 人民を組織する ことによつてう ち倒される。(毛 沢東, 1966 / 1966b, 頁 16)

在「靠」一詞，譯本皆用「よつて」或「かかっている」，但研究會增譯了「のみ」（只有），以及「できる」（能夠）。使用「のみ」，研究會譯本將能夠組織人民、打倒反動分子的對象，限定在「我們」，即中國共產黨上。在後半句增譯動詞「できる」，使句意被改為：中國的反動分子，只有靠我們組織起人民才能夠把他打倒。

增譯幾乎只在研究會譯本出現。《毛語錄》同章第十九項云：「如果對這種形勢〔指中國的階級意識〕認識不足〔……〕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毛澤東，1995，頁 15）。唯獨研究會譯本添加了連詞，改變了句子結構：

表 6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十九項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もしもこうした情勢に ついて認識が足らなか ったり〔……〕絶大な 誤りを犯すであろう し、ひいては必要な思 想闘争をないがしろに することになる。(毛 沢東, 1966 / 1966a, 頁 34)	こうした情勢につ いて、認識が不足し たり〔……〕ひじょ うに大きな誤りを 犯すだろうし、必要 な思想闘争を無視 するだろう。(毛沢 東, 1966 / 1971, 頁 39)	もしも、こうした情勢 にたいして認識がたり なかったり〔……〕ひ どい誤りをおかすこと になり、必要な思想闘 争を無視することにな るであろう。(毛沢東, 1966 / 1966c, 頁 17)	もし、こうした情勢 について、認識が十 分でなかったり 〔……〕大變な誤り を犯すことになるし、 必要な思想闘争を無 視することになる。 (毛沢東, 1966 / 1966b, 頁 22)

研究會譯本增譯了「ひいては」（甚至），將「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的嚴重性置於「犯絕大的錯誤」之上，深化了對「形勢」不了解的嚴重性。原文是並列句式，將兩種後果並置，而其他譯本的句式譯法，都較忠於原文。

增譯並非研究會譯本獨有的翻譯方法，但與其他譯本相比，在相同地方增譯時，研究會譯本在相似句式上有選取語氣較重者的傾向。例如在《毛語錄》第二章第四項，毛澤東指：「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逼，逼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毛澤東，1995，頁8）。在「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一段，研究會譯本與譯本④均在「舉行起義」前加上「一定／不得不」：

表 7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四項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農民は何回も蜂起をおこなって、地主階級の統治に反抗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 （毛沢東，1966 / 1966a，頁 25）	農民は、地主階級の支配に反抗して、何度となく暴動を起こした。（毛沢東，1966 / 1971，頁 28）	農民をいくたびか蜂起させ、地主階級の支配に反抗せざるを得なくさせた。（毛沢東，1966 / 1966c，頁 13）	農民をして、地主階級の支配に反抗して、何度となく暴動をおこさせた。（毛沢東，1966 / 1966b，頁 16）

研究會譯本與譯本④均增譯了「農民」是「不得不」反抗「壓逼」，前者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和後者的「ざるを得ない」都屬雙重否定句式，但語意上有細微分別。前者是義務與責任上的反抗，較肯定行為的必要性；後者則相對軟性，是無可奈何、逼不得已的反抗，相對消極。研究會譯本，正如在發刊辭中對毛澤東思想的熱情，選擇前譯，顯得匹配。

為頌揚毛澤東思想，翻譯過程中既有加強他的偉大之處，亦有深化敵對者的頑劣，如帝國主義者負隅頑抗的一面。在《毛語錄》同章第十七項，言「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要作最後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會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毛澤東，1995，頁13）。研究會譯本也有增譯：

表 8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十七項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帝國主義者と国内の反動派は〔……〕 <u>か</u> ならずや最後のあがきをするであろう。全国が平定されたのちも、彼らは各種各様の方式で、破壊とじょう乱をすることができ、毎日毎時となく、旧中国の復活をたくらむであろう。(毛沢東, 1966 / 1966a, 頁 32)	帝國主義者および国内の反動派は〔……〕最後のあがきをするだろう。全国平定後も、彼らは依然として、いろいろな形で破壊や攪乱に従事し、一日も休まず、 <u>中国での復辟をたくらむ</u> ことだろう。(毛沢東, 1966 / 1971, 頁 37)	帝國主義者と国内の反動派は〔……〕最後のあがきをするであろう。全国が平定されてからも、彼らはやはりさまざまな方法で破壊と攪乱を行い、毎日、毎時間、 <u>中国でのその支配を復活しよう</u> とたくらむであろう。(毛沢東, 1966 / 1966c, 頁 16 - 17)	帝國主義者および国内反動派は〔……〕かれらは最後のあがきを試みようとしている。全国平定後も、かれらは依然として、いろいろな形で破壊や攪乱をやっているし、これからあらゆる機会をみつけては、 <u>中国での復辟をねらう</u> ことだろう。(毛沢東, 1966 / 1966b, 頁 21)

毛澤東認為中國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已基本取得成功，但還要提防「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作最後的掙扎」。研究會譯本添加了「かならずや」（必定），毛澤東的預測，在研究會譯本上成了必然發生的事，加強了原句中對各種敵人的危險性。

此段譯文中還應注意到研究會譯本有一誤譯：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將密謀「在中國復辟」。譯本②、④、⑥將此句譯為「彼らは〔……〕中国での復辟（復活）をたくらむ（ねらう）」（他們〔……〕企圖／試圖在中國復辟／復活），合乎原意。唯獨研究會譯本譯為「彼らは〔……〕旧中国の復活をたくらむ」，即「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企圖使「舊中國」復活，乃錯誤理解原文。如同上文曾指出將「行動」誤譯為「暴動」一樣，研究會譯本是所有譯本中誤譯最多。我們無法知道譯者的誤譯是刻意還是無意——即使這些誤譯實在遠比其他譯本多，問題是這些誤譯對讀者理解造成甚麼結果？造成誤譯的可能原因會是甚麼？以下將就研究會譯本的誤譯進行討論。

研究會譯本最常見的誤譯，是將原文「應」（應該、應當）及「要」（就

要、都要) 傾向以「なければならぬ」(一定/不得不) 翻譯。這傾向其實所有譯本或多或少都有, 研究會譯本則較頻繁。以下兩例, 分別來自《毛語錄》第一章第六項「我們應當相信群眾, 我們應當相信黨, 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毛澤東, 1995, 頁 3), 和第五章第九項「誰想奪取國家政權, 並想保持它, 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毛澤東, 1995, 頁 48)。前者「應當」與後者「應有」, 都只有研究會譯本譯為態度更肯定的「一定/不得不」:

表 9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一章第六項「應當」、第五章第九項「應有」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われわれは大衆を信じ、党を信じなければならぬ。この二つは根本的な原理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a, 頁 19)	われわれは大衆を信じるべきである。党を信じるべきであり、これは、根本的な二つの原理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71, 頁 22)	われわれは大衆を信じ、党を信じるべきであり、これは二つの根本原理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c, 頁 10)	大衆を信賴すること、党を信賴すること、この二つは、われわれが守るべき根本原理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b, 頁 10)
国家権力を奪取して、それを保持しようとする者は誰でも、強大な軍隊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ぬ。(毛沢東, 1966 / 1966a, 頁 72)	国家権力を奪取し、しかもそれを保持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は、強大な軍隊をもつべき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71, 頁 74)	国家の政治権力を奪取し、しかもそれを保持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はみな、強大な軍隊をもつべき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c, 頁 39 - 40)	国家権力を奪取し、しかもそれを保持しようとする者は、強大な軍隊をもつべき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b, 頁 53)

甚至, 研究會譯本亦偶爾將既不是「應」或「要」的原文, 也譯成「一定/不得不」。如第四章最後一項: 「匈牙利事件的這教訓〔指敵人在人民中挑動矛盾〕, 值得大家注意」(毛澤東, 1995, 頁 44)。在應「注意」的程度上, 以研究會譯本最高, 譯本④次之, 只有譯本②最合乎原文意思。

表 10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四章末項「值得大家注意」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ハンガリー事件のこのような教訓は、われわれが大い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である。(毛沢東，1966 / 1966a，頁 67)	ハンガリー事件のこうした教訓は、すべての人々が注意するのに値する。(毛沢東，1966 / 1971，頁 69)	ハンガリー事件のこうした教訓は、みなが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る。(毛沢東，1966 / 1966c，頁 37)	ハンガリー事件があったこの教訓に、すべての人々は注意をはらうべきである。(毛沢東，1966 / 1966b，頁 49)

研究會譯本的誤譯問題最嚴重，傾向選用程度最高的句式。⁵ 此譯本也有其他各式各樣的誤譯，出錯程度最嚴重，甚至在《毛語錄》首章第二項「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的黨」（毛澤東，1995，頁 1）已經出現：

表 11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一章第二項「革命的黨」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革命をしようとするからには、 <u>革命政府</u> が必要である。(毛沢東，1966 / 1966a，頁 17)	革命をやりたいのだから、 <u>革命党</u> が必要。(毛沢東，1966 / 1971，頁 20)	革命をおこなうからには、 <u>革命党</u> 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毛沢東，1966 / 1966c，頁 9)	革命を実行するからには、 <u>革命党</u> というものが必要だ。(毛沢東，1966 / 1966b，頁 9)

將原文「革命的黨」直接搬字過紙為日語既有漢字「革命党」已經圓足，將之譯為「革命政府」反而多花了筆墨。革命黨與革命政府顯然是兩個相異概念，因為政黨可以是在野黨或是執政黨，但政府則顯然是執政者。

相似誤譯，也在《毛語錄》第五章第一項「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毛澤東，1995，頁 45）出現，如將「階級」譯為「階級社會」：

⁵ 其他譯本並非沒有這傾向。例如《毛語錄》第四章第二項有「應該首先弄清楚甚麼是人民，甚麼是敵人」（毛澤東，1995，頁 35）一句，四種譯本同樣譯為「はっきり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即「一定要讓弄清」。但整體來說，這傾向以研究會譯本最明顯。

表 12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五章第一項「階級」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戦争——それは私有財産と階級社会が発生してから始まったもので。(毛沢東, 1966 / 1966a, 頁 68)	戦争——それは、私有財産と階級が出現したときから存在した。(毛沢東, 1966 / 1971, 頁 70)	戦争——それは私有財産と階級が発生してから始まったものであり。(毛沢東, 1966 / 1966c, 頁 37)	戦争——それは、私有財産が出現し、階級が出現してからはじめられたところの。(毛沢東, 1966 / 1966b, 頁 50)

類似誤譯不勝枚舉，亦有錯字、句讀錯誤等其他問題，毋須再一一舉出。在句式選擇上加強了《毛語錄》原文的語氣，而這些誤譯或誤植，除了使讀者對原意理解出現偏差外，很難說還有其他影響。更重要的是，為什麼研究會譯本的翻譯錯誤最多？過往的研究提醒我們不應馬上得出譯者的意識形態影響譯文準確度之結論，但從研究會譯本的翻譯方法來看，它有更加深化、肯定《毛語錄》內容的傾向。它頻繁誤譯，除了譯者水平不足外，也不能忽視它急於推出市面的因素。

如前文提及，研究會譯本是先翻譯出版，後得中方「諒解」。譯者群寫下的發刊辭，以毛澤東思想為「惑星」，表達了對毛澤東的崇拜、欲積極發揚毛澤東思想的熱誠。在各種 1966 年的民間譯本中，以研究會譯本最早印刷發行，捷足先登，進占市場。可以想像一群在文革時期熱衷於毛澤東思想的日本左翼政黨員，看到文革爆發，全國上下一遍狂熱，於是同受鼓舞決定翻譯《毛語錄》，想盡快引入這本「小紅書」，務求最快出版，翻譯質素自然降低。這過程固然只是想像，但就翻譯問題而言，研究會譯本偏離原意者最多，可以歸類各種幾項因素：第一，翻譯能力與外語知識不足；第二，全面擁護毛澤東思想，故有刻意深化原文意思、加強原文語氣的嫌疑；第三，急於推出市場，疏於校正。這些因素互相影響，且《毛語錄》本身已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又被再製造了一個意識形態更加濃厚的版本，同時是翻譯最粗糙的譯本。

還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會譯本是唯一沒有解說文章、幾乎沒有註釋的民間譯本，在形式上與精簡的《毛語錄》最相似。從前述的研究可見，翻譯者本身必然受社會及意識形態影響，翻譯本身就是意識形態活動，雖然並不保證譯文的信度本身也會受到意識形態影響，但研究會譯本的例子恰好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它既反映了譯者的意識形態，其信度亦明顯較差。

參、流動的意識形態——竹內實譯本的註釋

漢學研究者竹內實於 1971 年首度翻譯出版《毛語錄》，1995 年修訂後再出版，是日本唯一推出兩種《毛語錄》譯本的學者。竹內譯本的最大特色是註釋量豐富，註釋項數、篇幅遠勝其他譯本，一些註釋甚至比該語錄本身還要長。其註釋內容大體分為三種：一、補充或解釋該項目蘊含的毛澤東思想；二、解釋專有名詞；三、列出並解釋原文典故出處。竹內譯本工於考證、註釋詳盡、翻譯嚴謹，附上毛澤東年表，知性勝於其他譯本，亦令本來應是鬥爭工具的《毛語錄》化為一冊書卷氣極重的知識讀物。

竹內實在中國山東省出生和成長，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特別關注中國文學與文人，曾翻譯多種中國書籍。竹內仰慕毛澤東，曾在文革以前親身見過他，覺得他有「自信、霸氣」，令人聯想到「中國名畫中常常見到的猛虎」，也會尊稱他為「主席」（竹內實，1972，頁 69、71）。竹內讀《毛語錄》時最喜歡、感受最深刻的是以下一段：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於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於青年，一貫的有益於革命，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毛澤東，1995，頁 196）

竹內認為這是「平凡的真理」（竹內實，1971，頁 396）。然而竹內否定文革，認為文革是一種破壞（馬場公彥，2010，頁 246）。學者一般將竹內歸類為左翼學者，但他對中國和毛澤東的感情相當複雜，較之於毛澤東語錄研究會全盤支持毛澤東及文革，和之後提及的中嶋嶺雄全盤否定兩者，竹內雖否定文革，但個人對毛澤東有特殊感情。

然而，竹內這樣複雜的感情沒有反映在其譯文上，單憑譯文本身，無法看出竹內對毛澤東或文革的情感。他是唯一公然說有最喜歡的語錄之譯者，其譯本反而忠於原著，如在《毛語錄》第四章末項「值得大家注意」（毛澤東，1995，頁44）一句中，只有竹內譯本以「値する」譯「值得」外（見表10），在第三章第十三項「貧農必須向中農做工作、把中農團結到自己方面來，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擴大，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毛澤東，1995，頁25），只有竹內譯得準確：

表 13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三章第十三項「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貧農は中農にはたきかけて、中農を自分の側に團結させねばならない。そうしてこそ革命は一日一日と拡大して、 <u>最後の勝利をえられるのである。</u> （毛沢東，1966 / 1966a，頁46）	貧農はかならず、中農にたいして <u>工作し、最後の勝利をかちとるまで革命を日ま</u> しに拡大して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毛沢東，1966 / 1971，頁50）	貧農はぜひと <u>も中農にはたきかけ、自分たちの側に團結させ、革命は日一日と拡大し、最後の勝利をかちとらなければなら</u> ない。（毛沢東，1966 / 1966c，頁24）	貧農は、中農が自分たちの側につくよう、中農にたいしてはたきかける必要がある。こうすれば、革命は日一日と拡大され、 <u>ついには最後の勝利をおさめることができる。</u> （毛沢東，1966 / 1966b，頁32）

毛澤東原文的意思是在得到「最後的勝利」前，「貧農必須向中農做工作」，譯本①、④、⑥將之理解為條件句，即「貧農必須向中農做工作」，在最後會得到勝利，屬錯誤理解，唯獨竹內理解原文意思。竹內治學嚴謹，曾出版多種中國文獻的譯本，加上出版時間較後，有參考其他譯本的機會（竹內実，1971，頁396－397），與各1966年版本相比，其譯文可信度最高。

相比研究會譯本在譯文裡已滲透出對毛澤東思想的熱情，像竹內這樣對毛澤東有深厚感情的學者，因要在翻譯上追求信度，恪守學術原則，在譯文上並無插手的空間。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日兩國的社會運動達到高峰，其翻譯可以完全抽空社會氣氛嗎？本文認為竹內譯本的註釋，是最能

體現其意識形態之處，其註釋有數項特色：第一，補充、延伸原文內的毛澤東思想；第二，流露對蔣介石的厭惡；第三，展示對中國文化、掌故和語言的熟悉，符合譯者對中國的感情。以下將分述各項特點，並對照兩種譯本，考察竹內豐富的註釋如何折射出其左傾卻複雜的意識形態。

首先，在 1971 年舊譯本的註釋中，竹內會補充或延伸毛澤東思想，間中亦會闡述個人看法；1995 年新譯本則傾向將個人看法刪去，或修改用詞，務求降低主觀色彩。以下四例分別來自《毛語錄》首章「共產黨」首項：「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1995，頁 1）。第七項：「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毛澤東，1995，頁 3）。第十五章「三大民主」第三項：「目前在我軍部隊中熱烈進行的三查、三整」（毛澤東，1995，頁 124）。以及第十七章「為人民服務」第五項（毛澤東，1995，頁 134）。竹內為四項語錄中的「中國共產黨」、「工作」、「三查三整」，以及出處〈為人民服務〉註釋。兩譯本的註釋同中有異：

表 14

竹內實兩譯本對「中國共產黨」、「工作」、「三查三整」、「〈為人民服務〉」的註釋

譯本②	譯本③
<p>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中採用的新規約，規定「<u>黨的最終目的在實現共產主義。</u>」因不限定於「在中國」，<u>明確表示其目標是實現世界革命。</u>（毛澤東，1966 / 1971，頁 19）</p>	<p>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中採用的新規約，規定「黨的最終目的在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1966 / 1995，頁 32）</p>
<p>原文為「工作」。「工作」指極普通的一般工作、勞動。亦指黨或軍隊的，<u>基於計劃而被限定的活動。至於這詞語的語感，蘊含一種感情，即從事的勞動和工作不是為了換取報酬或月薪。另外，這詞語也有專指勞動或工作本身的感覺。</u>（毛澤東，1966 / 1971，頁 22）</p>	<p>原文為「工作」。指一般工作、勞動、活動。（毛澤東，1966 / 1995，頁 35）</p>

（續下頁）

表 14

竹內實兩譯本對「中國共產黨」、「工作」、「三查三整」、「〈為人民服務〉」的註釋（續）

譯本②	譯本③
<p>三查、三整是整頓黨和軍隊的重要運動，中國共產黨在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結合土地改革進行。所謂「三查」，在軍隊以外指檢查出身階級、思想、作風，在軍隊則是檢查出身階級、活動、鬥志。所謂「三整」，指整頓組織、思想、作風。（毛澤東，1966 / 1971，頁 147）</p>	<p>所謂「三查」，在軍隊指檢查出身階級、活動、鬥志，在軍隊以外則是檢查出身階級、思想、作風。所謂「三整」，指整頓組織、思想、作風。（毛澤東，1966 / 1995，頁 160）</p>
<p>1944 年 9 月 5 日，〔張思德〕在陝西省北部安塞縣山中燒炭時因窯洞塌方犧牲。（毛澤東，1966 / 1971，頁 157）</p>	<p>1944 年 9 月 5 日，〔張思德〕在陝西省北部安塞縣山中燒炭時因窯洞塌方死亡。（毛澤東，1966 / 1995，頁 170）</p>

竹內的註釋從兩種方法向讀者解釋毛澤東思想：第一，以毛澤東思想解釋毛澤東思想；第二，以自己意見補充。兩者有時會同時出現。前者如對「三查」、「三整」的定義，因為考慮到語錄本身就是文章、發言的簡略片段，沒有前文後理，讀者未必有相關背景知識，因此以毛澤東本身的說話來做註似乎相當適合。但這解釋方法同時直接傳播並深化了毛澤東思想。後者如對「工作」的解釋，竹內憑自己的解讀方法放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願景，認為其革命目標不止於中國，而在世界。他聖化了中國人的新工作作風，認為「工作」一詞有一種滅私奉公、無私奉獻的感情，還提到「三查三整」在中國共產黨與軍隊中的重要。這些主觀描述在新譯本中被刪除，或許竹內意識到身為譯者，除了譯文，註釋都應該持平。兩譯本的譯文幾乎一樣，竹內只提到自己在新譯本的「譯文上若干加筆，使之易讀」（竹內實，1995，頁 6），但事實上新譯本刪減最多的是註釋。在提及「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身故之事跡時，舊譯本用相對主觀的「犧牲」，新譯本用客觀的「死亡」，可見不能純粹以「使譯本易讀」為由，解釋竹內大幅改動註釋之舉。

另一方面，竹內尊崇毛澤東，故在《毛語錄》提及蔣介石時，其註釋毫不掩飾對蔣介石的厭惡。竹內的新譯本對相同註解的文字也有修改，顯得舊

譯本註釋的左傾意識形態更明顯。《毛語錄》於第二章首次提到蔣介石，對照竹內兩種譯本對「蔣介石」的註釋：

表 15

竹內實兩譯本對「蔣介石」的註釋

譯本②	譯本③
蔣介石〔……〕雖然在「北伐」開始後成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官， <u>但</u> 途中，1927年4月12日，發動反共政變，鎮壓共產黨，於南京樹立同〔國〕民政府。雖然於抗日戰爭中與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 <u>但一貫採反共政策</u> 。國民黨主席。1948年當選初代中華民國大總統。（毛澤東，1966／1971，頁31）	蔣介石〔……〕「北伐」時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官。1927年4月12日，發動反共政變，鎮壓共產黨，於南京樹立國民政府。抗日戰爭中與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國民黨總裁。1948年當選初代中華民國大總統。在大陸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中落敗，將國民政府移到臺灣，在臺灣死去。浙江省人。（毛澤東，1966／1995，頁44）

新譯本除補充一些史實外，竹內更動了內容和句法。在內容上，刪除了指控蔣介石在結成統一戰線後「一貫採反共政策」。竹內俯視歷史發展，認為蔣介石即使與共產黨聯手抗日，但其內心仍是反共，乃指出蔣介石「一貫」反共，在相當程度上以唯心的角度評價蔣介石。在句法上，新譯本將兩個「雖然……但……」（……が、……）的轉折複句刪去。轉折複句強調句子後半，在舊譯本，竹內要突出並批評的是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鎮壓共產黨」以及「一貫採反共政策」。新譯本的更動，突出了舊譯本譴責蔣介石的意圖。

竹內亦在註釋直接批判蔣介石。《毛語錄》第二章第十一項提及「我們」的敵人是「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毛澤東，1995，頁11），沒有提及蔣介石。竹內注解「軍閥」卻借題發揮：

表 16

竹內實兩譯本對「軍閥」的註釋

譯本②	譯本③
<p>清朝末期取代衰弱的滿洲「八旗」的軍事力量，以漢人為主體而創設的新式軍隊。將校為地主層出身，與地方封建勢力結合，於中華民國成立後仍在駐屯地域軍隊的支配之下。這就是軍閥，其中，有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勢力。要將之打倒的就是國民革命軍發起的「北伐」，但它的總司令<u>蔣介石</u>也不外乎是<u>新軍閥</u>。大小軍閥背後有各國帝國主義，為獲得各自的利權，軍閥互相之間的內戰無日無之。戰爭掠奪、為了補充士兵而擄拐青壯年等，<u>破壞民眾生活的就是軍閥</u>。（毛沢東，1966 / 1971，頁 32 - 33）</p>	<p>清朝末期取代衰弱的滿洲「八旗」的軍事力量，以漢人為主體而創設的新式軍隊。清朝滅亡後，地方駐屯的司令官私兵化，於中華民國成立後仍各自在駐屯地域的支配之下。這就是軍閥，其中，有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勢力。要將之打倒的就是國民革命軍發起的「北伐」。大小軍閥背後有各國帝國主義，為獲得各自的利權，軍閥互相之間的內戰無日無之。戰火帶來的破壞、掠奪暴行、為了補充士兵而擄拐青壯年等，使民眾生活陷入混亂。（毛沢東，1966 / 1995，頁 44）</p>

竹內提到「北伐」時以引號括著，因為舊譯本中他認為蔣介石是「新軍閥」，「新軍閥」討伐軍閥是矛盾，並沒有合法性，竹內對蔣介石的厭惡躍然紙上。同樣，竹內將「破壞民眾生活」的罪魁禍首歸咎於「軍閥」之上，由於他認為蔣介石是「新軍閥」，當然要承擔責任。在新譯本，竹內刪去直接批評蔣介石的句子，將「民眾生活陷入混亂」的責任重新歸咎在「戰火」、「內戰」之上。《毛語錄》第十九章「革命英雄主義」第五項對「北伐戰爭」的註釋，亦看到竹內的厭惡情感：

表 17

竹內實兩種譯本對「北伐戰爭」的註釋

譯本②	譯本③
<p>指 1926 年 7 月，國民革命軍於廣東省出發北上，以討伐北洋軍閥的戰爭。因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指導，得勞工、農民的廣泛支持，所以急速進軍長江（揚子江）流域，佔領約半個中國。〔19〕27 年 4 月 12 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u>蔣介石</u>於上海發動<u>反革命政變</u>，<u>虐殺共產黨員、勞工</u>，波及各地，<u>奪取革命的成果</u>。（毛沢東，1966 / 1971，頁 165）</p>	<p>指 1926 年 7 月，國民革命軍於廣東省出發北上，以討伐北洋軍閥的戰爭。因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指導，得勞工、農民的廣泛支持，所以急速進軍長江（揚子江）流域。1927 年 4 月 12 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u>蔣介石</u>發動政變，<u>虐殺共產黨員、勞工</u>，波及各地，<u>奪取北伐的成果</u>。（毛沢東，1966 / 1995，頁 180）</p>

但竹內的批評有矛盾。他批評國民黨是「新軍閥」，「北伐」不過是新軍閥打舊軍閥、是導致民不聊生的戰爭，可是他又同時認為「北伐」之所以有大好形勢，乃得中共吸引了廣泛支持之故，是一場「革命」。按此雙重標準，北伐在國民黨領導下是「破壞民眾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則是具成果的「革命」。新譯本將「反革命」刪去，改「革命」為「北伐」，將其主觀色彩抹去，反而清楚顯示了文革期間竹內的立場。

最後，竹內譯本的註釋能反映竹內對中國學問之深，乃至對中國文化的感情。其譯本在眾譯本之中對《毛語錄》關於傳統思想、文化解釋得最詳盡，保留原文漢字詞語、諺語、古典，以註解釋的傾向，較少為遷就日本讀者而將中國典故意譯（paraphrasing）。據筆者所查，在各譯本皆意譯或誤譯，唯獨竹內保留原文的詞語有「中流砥柱」、「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等（毛澤東，1966 / 1971，頁 21、30），凡有運用古典之處，皆註明古語、諺語出自何經何典。這種富於考證的註釋，與前述反映竹內擁毛反蔣的意識形態形成一種軟性對照：竹內高度評價毛澤東，厭惡蔣介石，又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厚感情，曾說過「中國是自己的『第一故鄉』」（程麻，2013，頁 5）。其《毛語錄》譯本的註釋，就能看到竹內對毛澤東、文革、中國的複雜感情。

竹內身為學者，對翻譯準確度的要求嚴謹、工於考據，兩譯本的譯文忠於原著，就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來說，並不可能憑譯文判斷其受意識形態影響之處，但這並不代表譯者沒有方法宣洩、明示或暗示其意識形態的地方。在市場、讀者或譯者自己對譯文信度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下，譯者亦有辦法在翻譯之中主動或被動投入其意識形態，而無損其「翻譯」的可信度。在竹內的個案，那就是註釋。翻譯「信、達、雅」的要求往往指向譯文本身，註釋未被限制在內。竹內兩種相距 20 多年的譯本譯文差異不大，但註釋相異，從中看到了譯者從熱情到冷淡的意識形態之流動。

肆、「敵對」譯本？中嶋嶺雄的《毛語錄》譯文

儘管竹內舊譯本與中嶋嶺雄 1973 年譯本（下稱中嶋譯本）同在文革時期出版，但相差兩年的譯本所處之社會氣氛完全不同。中嶋嶺雄是日本的右翼學者，質疑毛澤東思想、否定文革（中嶋嶺雄，1971，頁 288—351），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前途悲觀，是「中國威脅論」的倡議者之一（劉智璋，2008，頁 128—129）。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文革在中國已陷入停滯，且日本經歷新左翼聯合赤軍的血腥肅清事件和挾持人質的淺間山莊事件後，國內普遍對激進左翼運動反感。因此，中嶋在 1973 年頗有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在其譯本中批評《毛語錄》在中國受到狂熱追捧並非因為語錄內容：

《語錄》的信仰，對中國民眾來說是對毛澤東崇拜的一種象徵式自我的確認，無論那些斷章怎樣屢屢成為口號、大合唱的格言，或許也不可以說它的根底裡規定了民眾的實存。（中嶋嶺雄，1973a，頁 279）

他提到香港曾有《劉少奇語錄》，但隨劉少奇失勢，則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讀物，他預測《毛語錄》可能會落入同一命運：

假如將來中國在某日出現價值轉換，毛澤東自身在歷史中被正當地相對化，《語錄》所具有的魔術效力，也有可能在一瞬間失去。儘管我們毋須想起我國戰時中的《教育勅語》，但在言語或文章自身被絕對化、物神化的瞬間，它就開始踏上終究應成為死語的命運吧。（中嶋嶺雄，1973a，頁 279—280）

中嶋在文革逐漸被否定的社會氣氛之下翻譯《毛語錄》，他不僅是「潛在的敵對」譯者，本身就是衝著文革衰頹之勢而翻譯。問題是，中嶋的譯文受到其意識形態影響嗎？為了驗證中嶋的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本節將從譯本⑤的譯文、解說譯本的文章為主，譯本④為輔作討論。⁶

⁶ 目前幾乎沒有任何關於譯本④譯者市村水城的資料。中嶋在譯本④寫了一篇〈出典解說——毛澤東思想小史〉，該文經修改後以〈出典解題——「毛澤東思想」の展開〉為題刊登在譯本⑤。兩譯本應有關係，不過將市村與中嶋的意識形態劃上等號是武斷和不當的，故此處集中討論譯本⑤。

中嶋對於顯示語氣、程度的用詞處理得相當仔細，有刻意降低原文語氣的傾向。本文曾提及所有譯本對「要」（就要）或多或少譯成「一定／不得不」的傾向，在程度上「要」介乎於「應要」與「必要」之間，各譯者皆以自身的理解，選擇其在日語表現的意向程度。《毛語錄》第二章第十四項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1995，頁12）。對於「就要擁護」、「就要反對」，所有譯本都是以譯為「擁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毛澤東，1966／1966a，頁31）、「支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毛澤東，1966／1966b，頁20），或「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毛澤東，1966／1971，頁36），與中嶋相關的兩種譯本則有不同：

表 18

中嶋嶺雄監修與翻譯的譯本對「就要」的翻譯

譯本④	譯本⑤
なんでも支持するだろうし〔……〕なんでも反対するだろう。（毛澤東，1966／1966c，頁16）	擁護すべきであり〔……〕なんでも反対すべきである。（毛澤東，1966／1973，頁21）

中嶋譯本參考過所有譯本，也包括自己早年監修的譯本（中嶋嶺雄，1973b，頁4）。中嶋譯本以「べき」（應該）譯，經過考慮與取捨，並不是純粹將已有的譯本搬字過紙。毛澤東原文表示的程度，似乎在「應該」與「一定」之間。中嶋譯以「べき」，是個負責任的翻譯，其語感沒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來得強烈，但又不像「だろう」般含不肯定的推量，沒有將原文的「就要」推進至「一定」。再舉第三章第十項為例：「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毛澤東，1995，頁24）。中嶋譯本對「就沒有」的翻譯，也是返璞歸真：

表 19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三章十項「就沒有」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③	譯本④	譯本⑤	譯本⑥
全面的な強固な社会主義はありえない。(毛沢東，1966 / 1966a，頁 44)	欠けたところのない(、)強固な社会主義はない。(毛沢東，1966 / 1971，頁 47 - 48，1966 / 1995，頁 60)	全面的で強固な社会主義はあり得ない。(毛沢東，1966 / 1966c，頁 23)	全面的で強固な社会主義はない。(毛沢東，1966 / 1973，頁 30)	全体が一つにまとまった強固な社会主義は存在しない。(毛沢東，1966 / 1966b，頁 30)

譯本①與④皆譯為「不可能(有)」，否定程度甚於原文；譯本⑥譯為「不存在」亦略嫌花巧；唯有中嶋與竹內譯本只譯作「沒有」，最質樸自然。

本文無意再逐個舉例，因為相比證明譯者或作者「有」意圖表達什麼，則只須在文字裡尋找其「有」的證據；然而要成功證明譯者或作者「沒有」意圖表達甚麼，恐怕難有什麼發現。即使像中嶋這樣「敵對」的譯者，讀者和研究者都難以在其譯文中找到證據，證實其意識形態介入了翻譯，甚至如同竹內譯本一樣，中嶋附上毛澤東年譜，也附上約 60 頁的解說，列出每項語錄的原典。竹內在註釋中表達不少個人評論，但中嶋在解說語錄原典時完全沒有，亦幾乎沒有註釋，唯一展露其對毛澤東的否定、對《毛語錄》的悲觀預期，只在另外的解說文章內。「敵對」的中嶋，其翻譯可謂比「友好」的研究會、竹內所受意識形態干擾更少。確實，中嶋幾乎對中國的大部分事情都感到悲觀，但還是維持了翻譯者的責任，並對自己的譯本評價：「本書畢竟只是以譯者的責任，嘗試做到最好的新譯」（中嶋嶺雄，1973b，頁 4）。

伍、結語

本文考察了日本民間《毛語錄》譯本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討論的譯本囊括了個人與團體譯者，有相同譯者的不同譯本，不同意識形態的譯者群，有貼近文革爆發初期、文革失速，以及到 90 年代事過境遷的譯本。透過橫向和

縱向比較，我們既能在同時代的《毛語錄》譯本中，篩選出翻譯較受意識形態影響的譯本，亦能就同一譯者不同時代的翻譯，窺探譯者意識形態的流動。

就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而言，本文發現像中嶋嶺雄這樣對原文內容或作者持敵對或否定態度的譯者，雖然會在譯本以內、譯文以外的地方明確表達否定意見，但不影響翻譯素質，合乎 Munday (2007) 對政治文本的考察。不過，對原文作者持友好態度的翻譯呈現兩種情況：第一，像毛澤東語錄研究會這樣對原文及作者趨之若鶩的譯者，或因出版趕急，譯文質素粗疏；或有可能受意識形態驅動，譯文語氣較強、在細微處深化了原文的激烈程度、加強對毛澤東的褒揚。第二，像竹內實這樣的學者，雖然對毛澤東抱有感情，但翻譯亦相當準確，不過他透過註釋著手，補充並闡發了毛澤東思想、直接批評蔣介石，在遣詞用字上美化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綜合來說，反而是對原典友好的翻譯者，在翻譯過程更加受意識形態干擾。

日本譯者翻譯《毛語錄》的動機或多或少受社會氣氛影響，不過如果只在社會環境或時局內尋求翻譯與意識形態關係的答案，則恐怕會抽空翻譯者的內在動機，有只視之為被動地受環境驅動而翻譯之虞。不像文學作品能給予翻譯者很大的再製造空間，嚴格來說一段忠於原文的政治文本翻譯，最終往往仍是一段平平無奇的翻譯，尤其像竹內大致忠實於原文的譯本，其很多註釋的政治意味雖仍濃厚，但在其考據細緻嚴謹的註釋中，流露出對中國文化的愛慕。翻譯者本身的內在感情，顯然在翻譯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課題中占一重要席位。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毛澤東（1995）。《毛澤東語錄》。弘學堂書店。

【Mao, Z. D. (1995). *Maozedong yulu*. Hongxuetang Shudian.】

唐炎明、唐亞明（2019）。《〈毛主席語錄〉的誕生及其他：唐平鑄文革實錄》。香港中文大學。

【Tang, Y. M., & Tang, Y. M. (2019). “*Maozhuxi yulu*” de dansheng ji qita: Tang Pingzhu wenge shil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程映虹（2008）。《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田園書屋。

【Cheng, Y. H. (2008). *Maozhuyi geming: Ershi shiji de Zhongguo yu shijie*. Greenfield.】

程麻（2013）。〈編譯說明〉。載於竹內實，《竹內實的中國觀——第一本中文自選集》（頁5-7）。天地圖書。

【Cheng, M. (2013). Bianyi shuoming. In M. Takeuchi, *Zhuneishi de Zhongguo guan: Diyi ben Zhongwen zixuan ji* (pp. 5-7). Cosmos Books.】

劉智瑋（2008）。《拒絕中華思想——論中嶋嶺雄的中國觀與台灣敘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Liu, Z. W. (2008). *Jujue Zhonghua sixiang: Lun Zhongdaolingxiong de Zhongguoguan yu Taiwan xushi*.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and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英文文獻

Cook, A. C. (Ed.). (2014).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nico, S., & Munday, J. (2007). Encounters and clashes: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The Translator*, 13(2), 141-149.
- Gilbert, C. (2018). Social context,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In S. Harding & O. C. Cortés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pp. 225-242). Routledge.
- Hatim, B., & Mason, I.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Routledge.
- Munday, J. (2007).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A textual approach. *The Translator*, 13(2), 195-217.
- Munday, J., Pinto, S. R., & Blakesley, J. (2022).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Routledge.
- Tymoczko, M. (2014). Ideology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translator in what sense is a translator ‘in between’? In M. C. Pérez (Ed.), *Apropos of ide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ideology - 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p. 181-201). Routledge.

日文文獻

- 竹内実（1971）。〈あとがき〉。載於毛沢東，《毛沢東語録》（頁 392－397）。角川書店。
- 【Takeuchi, M. (1971). Atogaki. In T. Mō, *Mōtakutō goroku* (pp. 392-397). Kadokawa Shoten.】
- 竹内実（1972）。〈毛沢東主席との一時間半〉。載於竹内実，《毛沢東ノート》（頁 50－71）。新泉社。
- 【Takeuchi, M. (1972). Mōshuseki to no ichijikan han. In M. Takeuchi, *Mōtakutō nōto* (pp. 50-71). Shinsensha.】
- 竹内実（1995）。〈凡例〉。載於毛沢東，《毛沢東語録》（頁 5－6）。平凡社。

- 【Takeuchi, M. (1995). Hanrei. In T. Mō, *Mōtakutō goroku* (pp. 5-6). Heibonsha.】
中嶋嶺雄（1971）。《増補現代中国論：イデオロギーと政治の内的考察》。
青木書店。
- 【Nakajima, M. (1971). *Zōho gendai chūgoku ron: Ideorogii to seiji no naiteki kōsatsu*. Aoki Shoten.】
中嶋嶺雄（1973a）。〈『毛沢東語録』と文化大革命〉。載於毛沢東，《毛沢東語録》（頁 261－280）。講談社。
- 【Nakajima, M. (1973a). “Mōtakutō goroku” to bunka daikakumei. In T. Mō, *Mōtakutō goroku* (pp. 261-280). Kōdansha.】
中嶋嶺雄（1973b）。〈訳者まえがき〉。載於毛沢東，《毛沢東語録》（頁 3－4）。講談社。
- 【Nakajima, M. (1973b). Yakusha maegaki. In T. Mō, *Mōtakutō goroku* (pp. 3-4). Kōdansha.】
馬場公彦（2010）。《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
- 【Baba, F. (2010). *Sengo nihonjin no chūgoku zō: Nihon haisen kara bunka daikakumei, nicchū fukkō made*. Shinyōsha.】
〈文化大革命、高く評価する〉（1966年8月30日）。《朝日新聞》（東京朝刊），2。
- 【Bunka daikakumei, takaku hyōka suru. (1966, August 30). *Asahi Shimbun (Tokyo Morning Post)*, 2.】
毛沢東（1966a）。《毛沢東語録》（毛沢東語録研究会譯）。宮川書房。（原著出版年：1966）
- 【Mō, T. (1966a). *Mōtakutō goroku* (Mōtakutō Goroku Kenkyūkai, Trans.). Miyagawa Shobō.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毛沢東（1966b）。《毛沢東語録》（和田武司、市川宏譯）。河出書房新社。（原著出版年：1966）

【Mō, T. (1966b). *Mōtakutō goroku* (T. Wada & H. Ichikawa, Trans.). Miyagawa Shobō.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毛沢東（1966c）。《全訳毛沢東語録》（中島嶺雄監修，市村水城譯）。い
ずみ書院。（原著出版年：1966）

【Mō, T. (1966c). *Zenyaku mōtakutō goroku* (M. Nakajima, Ed., M. Ichimura, Trans.). Miyagawa Shobō.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毛沢東（1971）。《毛沢東語録》（竹内実譯）。角川書店。（原著出版年：
1966）

【Mō, T. (1971). *Mōtakutō goroku* (M. Takeuchi, Trans.). Kadokawa Shot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毛沢東（1973）。《毛沢東語録》（中嶋嶺雄譯）。講談社。（原著出版年：
1966）

【Mō, T. (1973). *Mōtakutō goroku* (M. Nakajima, Trans.). Kōdansh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毛沢東（1995）。《毛沢東語録》（竹内実譯）。平凡社。（原著出版年：
1966）

【Mō, T. (1995). *Mōtakutō goroku* (M. Takeuchi, Trans.). Heibonsh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毛沢東語録研究会（1966）。〈毛沢東語録発刊にあたり〉。載於毛沢東，《毛
沢東語録》（頁7-8）。宮川書房。

【Mōtakutō Goroku Kenkyūkai. (1966). *Mōtakutō hakkan ni atari*. In T. Mō, *Mōtakutō goroku* (pp. 7-8). Miyagawa Shobō.】

山中竜視（1967）。〈『毛主席語録』の各訳本について〉。《アジア經濟
旬報》，681，19-23。

【Yamanaka, R. (1967). “Mōshuseki goroku” no kaku yakuhon nitsuite. *Ajia Keizai Junpō*, 681, 19-23.】

